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五十四期 2004年6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54, June 2004.
(問題與討論)

馬戲團、解剖室、博物館 ——黑色維納斯在法蘭西帝國

戴麗娟*

Circus, Dissecting Room, Museum:
Black Venus in the French Empire

by
Li-Chuan Tai

關鍵字：霍騰托維納斯、人種秀、法國人類學、帝國科學

Keywords: *Hottentot Venus*, *ethnic shows*, *history of French anthropology*, *imperial science*

*本文主題原本是筆者為應邀撰寫的一本小書所構思，原計畫篇幅圖文共約七萬字；承蒙本專題負責人李尚仁先生之鼓勵，先行以單篇論文形式呈現。兩位匿名審查人對初稿之評論促使筆者進一步釐析本文核心問題，改進陳述形式，過程中獲益良多，在此向他們致上謝意。本文修改期間亦受益於邱澎生及史語所「近代歐洲的自然秩序與社會秩序」研究群同仁王道運、陳正國、張谷銘諸位先生的寶貴意見，謹此申謝。

收稿日期：2003年10月21日；通過日期：2003年12月26日。

Received: October 21, 2003; in revised form: December 26, 2003.

通訊地址：115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email: tlc@mail.ihp.sinica.edu.tw

服務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馬戲團、解剖室、博物館—黑色維納斯在法蘭西帝國*

摘要

藉著「霍騰托維納斯」——一個在十九世紀初被帶到歐洲展示的南非女子——事例所揭露的零星史實，本文試圖回溯十九世紀法國人類學作為一門新興科學的操作脈絡，並且探討土著人種的刻板形象如何在學界、娛樂界、官方的相互推波助瀾下深植人心，成為殖民時期留下的知識遺產中極受批評，卻也極難超越的一部份。

受到自然史作法的影響，發展中的人類學與人種研究以系列資料蒐集與分類、比較研究為主，逐漸形成一個以世界為範圍、以首都博物館為中心的長程資料蒐集網絡。博物館在此網絡中不僅是資料集中收藏的所在地，也是資料分析和理論出產的中心。博物館的陳列不僅是一種研究成果的發表，也是理論探索過程的一部份。研究者所選擇的陳列秩序與其物種分類的觀念有關。每一世界人種依其外部特徵在此資料庫的知識秩序中佔有特定的位置。而這樣的類型標本化也成為逐漸媒體化、企業化經營的土著人種展演之依據。這類土著展演的觀念和作法，乃至於以帝國博物館為資料中心所建立的長程網絡雖然在殖民時代得到相當助力，卻不因殖民事實的結束而消失。其影響力到今天仍然可見。

關鍵詞：霍騰托維納斯、人種秀、法國人類學、帝國科學

Circus, dissecting room, museum: Black Venus in the French empire

By means of an initial focus on the case history of the “Hottentot Venus”, the colored, South African human spectacle of 19th century Europe, this article reconstructs the practical context of French anthropology when it was still a new science, and shows how and in which places racial stereotypes that have become the most prevalent and criticized part of the legacy of the colonial period were forged and diffused in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by the continued interactions of scholars, government administrators and circus businessmen. Influenced by the practices of natural history, the developing anthropology concentrated on the collection of material and its classification, and also comparative studies. For that purpose, long-distance networks were established and in which museums played a central role. Museums were the place not only for the display of research results but also for the elaboration of scholars’ ideas regarding classification. In the conceptual order based on collection, each ethnic type occupied a given place. This anthropological typification became the foundation that underlaid ethnic shows. Both the long-distance networks and the ethnic spectacles that profited from colonialism did not end with decolonialization, but instead, they continue to influence our vision about people of color and our academic activities even up to the present.

Keywords: Hottentot Venus, ethnic shows, history of French anthropology, imperial science

* 本文主題原本是筆者為應邀撰寫的一本小書所構思，原計畫篇幅圖文共約七萬字；承蒙本專題負責人李尚仁先生之鼓勵，先行以單篇論文形式呈現。兩位匿名審查人對初稿之評論促使筆者進一步釐析本文核心問題，改進陳述形式，過程中獲益良多，在此向他們致上謝意。本文修改期間亦受益於邱澎生及史語所「近代歐洲的自然秩序與社會秩序」研究群同仁王道還、陳正國、張谷銘諸位先生的寶貴意見，謹此申謝。

前言

2002年夏天，法國政府透過立法¹將莎哈·巴特曼（Saartjie Baartman或Sarah Bartmann）之遺骸歸還南非政府進行安葬，雙方多年來針對此事的爭議與協商終於告一段落。大部分關心這個事件的人都為這個「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三重受害者」的返鄉感到欣慰：雖遲了將近兩百年，但正義終究得以伸張²。法國媒體也對政府這個符合後殖民時代的作法給予肯定和一定篇幅的報導³。在學界，關於這個俗稱為霍騰托維納斯（Hottentot Venus）或黑色維納斯的女性之討論在晚近二十年有增多的趨勢。大部分的文章都指出十九世紀初人種學的偏見，當時解剖巴特曼遺體並發表觀察報告的法國比較解剖學家居維業（Georges Cuvier）並且因此被某些後殖民研究的作者歸列到知名的歐洲種族主義者名單當中。

由於在台灣能夠掌握的原始材料有限，本文無意對已有的討論成果翻案或加以進一步詮釋，而是嘗試從前人未曾觸及的角度，將莎哈·巴特曼的事例置於兩個脈絡中討論。一個是異族、「原始」人種在西方世界如何從稀有的奇珍異物（curiosité）成為科學事實（fait scientifique），最後成為可以大量複製的現成文化消費品（prêt à consommer）的過程。另一個脈絡所思考的是十九世紀法國自然史領域的知識生產操作脈絡。第一個脈絡中所著重的是「原始」人種在西方社會文化中呈現性質的改變，屬於一種歷時性的思考。第二個脈絡中希望討論的是自然史操作面上所表現出來的結構性基礎和特徵，因此是屬於一種共時性的思考，把所涉及的種種面向視為一個環環相扣的整體來看待。這兩個脈絡的連結點在於居維業解剖莎哈·巴特曼的遺體並製成標本的這個事件上。而莎哈·巴特曼成為居維業的標本收藏中的一件的這項事實，也成為她後世名聲建立的基調。如果說在第一個脈絡中，也就是討論霍騰托女性印象在西方的這個脈絡，巴特曼的事例為其中最著名的事例，在第二個脈絡，也就是討論十九世紀法國自然史的知識生產活動的這個脈絡，巴特曼的事例倒像是一個偶然發生的小事件，整個法國自然史的發展並不會因為沒有它而改變。不過，對於我們而言，正是因為這樣一

¹ 有關草案的討論過程和最後通過的法律條文內容，可參見法國參議院網站www.senat.fr。

² 網路上相關的網站除了提供此人物和事件的片段資料外，大多採取此種角度來評論和報導這件事。國內也有以此立場出發、使用網路資料寫成的一本小書出版：莊新泉，《黑色維納斯》（台北：文經社，2002）。

³ 如*Le Figaro*, 15 Jan. 1999; 22 Feb. 2002; *Le Nouvel Observateur*, 14 Feb. 2002; *Le Monde*, 9 Aug. 2002.

個小事件所牽涉到的種種是一般我們在討論科學史的時候不習慣去注意的事物，它成了讓我們意外地掉入時間口袋的那個入口，讓我們必須直接切入十九世紀法國自然史和廣義人類學實際操作中的種種面向——而不是討論十九世紀學院裡相繼出現的理論內容——，才可能解答其中許多事件如何可能發生的疑問⁴。也是從這個操作面的討論過程中，此時期自然史在其生產過程中所表露出的帝國性格將會漸漸清晰。

有關於文章段落的安排，由於顧及台灣讀者可能對於此事件的主角人物及其事蹟未有聽聞，對現有的相關研究也不清楚，因此在第一部份先簡單敘述其生平以及後世研究，以便說明本文採取的取徑與既有的研究之不同。第二部份則是藉著這個案例所涉及的種種面向，重新來觀察十九世紀法國廣義人類學的知識生產操作脈絡。從當時相關的思想背景、材料的蒐集與動員、知識的生產與流通等面向綜合性地討論一個與異族有關的知識是在怎樣的物質條件和操作邏輯下產生，而這又對後世形塑該異族印象有何影響⁵。第三部份討論在居維業的解剖及鑑定後，霍騰托族的形象如何被其他機制接收與傳播。結語部份除了總結文中所處理的課題，也將對今日國際學術生產脈絡有所觀照。

I. 史事與後世研究

1. 莎哈·巴特曼其人其事⁶

一般認為，歐洲人對南非地區的認識始於 1652 年：該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於開普敦建立補給站，自此之後，歐洲人才開始與南非地區有持續性的接觸。而霍騰托（Hottentot）這個名稱也是在那個時期出現的。根據文獻記載，這原本是

⁴ 有關以實際操作面向而非以觀念史來討論科學活動的科學史取徑，參見 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87); Bruno Latour, *Le métier de chercheur: regard d'un anthropologue* (Paris: Institut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agronomique, 1995). Latour 後期的作品雖然在國際科學史學界引起頗多爭議，但是他在這部代表作中提供了許多具有啟發性的研究取徑，對相關領域的研究者來說仍然具有參考價值。此文並未運用 Latour 在 *Science in Action* 一書中所提到的所有概念，而只是參考他談到研究歷史中的科學活動所須注意的幾個綜合、互動的面向，亦即在理論思想為核心的架構下，實際操作中包括（1）材料、工具、人員的動員、（2）機構、職業等學術自主化的機制、（3）與政府、軍隊、工商、生產、教育等機制的合作（4）學術專業或研究成果對外呈現的部份。關於此綜合討論概念，讀者可以參考他在 *Le métier de chercheur* 一書中第 22 頁的圖示。

⁵ 於這一部份討論的事物互有牽涉交疊，時間跨越整個十九世紀，書寫上雖然受到需要劃分章節的限制，但是閱讀上希望讀者以各小節間相互呼應的方式理解。

⁶ 此節所陳述的資料主要是參考 François-Xavier Fauvelle-Aymar, *L'invention du Hottentot: Histoire du regard occidental sur les Khoisan, XV^e-XIX^e siècle*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2002)、Gérard Badou, *L'énigme de la Vénus Hottentote* (Paris: Jean-Claude Lattès, 2000)、以及在下一節「後世重新發掘的過程」部份所提到的作品，尤其是 Percival Kirby 的幾篇短文。

歐洲人賦予當地人的名稱；到了 1680 年代，連當地人也稱自己為霍騰托人⁷。在殖民南非的過程當中，歐人常無法分辨霍騰托人與布希曼人（Bushmen）之間的差別，所以時而以其中一詞通稱這兩個既是近親又偶有敵對關係的族群，時而又加以區分，名實對應變動不定的情況十分嚴重。唯一確定的是，不管是霍騰托人或布希曼人，都長期地被認為是歐人所識的世界人種中最低等的。

此事件的主角人物莎哈·巴特曼在 1789 年出生於南非的荷屬開普殖民地東部地區。她真正的姓已不可考，巴特曼是她的主人給她的姓氏，出現在她離開南非時的通關簽證和日後受洗的文件上。因為體型的關係，莎哈在其農場主波爾人 Hendrik Cezar 家中引起一位英國海軍醫官 Alexander Dunlop 注意。藉展示其身體來牟利的念頭由此而起。經過四個多月的海上旅程後，1810 年 9 月，莎哈·巴特曼與其主人及醫官三人到達倫敦。由於初期展示的安排工作進行得不順利，Dunlop 有意將莎哈連同一張也是從非洲帶回來的巨大長頸鹿皮一起賣給利物浦博物館。這個想法遭到館方拒絕後，Dunlop 放棄他所持有的部份經營權。莎哈便在 Cezar 一人的主導下在倫敦 Picadilly 區展開她的秀場生涯。由於 Cezar 擅於運用報紙宣傳，莎哈的人體秀立即受到注意，吸引大量觀眾，「霍騰托維納斯」的聲名從此不脛而走。維納斯在西方原是美臀女性的象徵；加上霍騰托種族的稱呼後，整個名詞變成一個頗為諷刺的組合：其所強調的雖然仍是臀部，但卻是霍騰托種族特有的肥臀（steatophygia），這與維納斯在西方審美眼光中所代表的美臀女神（the callipygian Venus）的形象是有相當距離的。Cezar 以此為宣傳重點，而觀眾也很清楚前來觀看的目的：傳說中霍騰托女性特殊的性器官。莎哈·巴特曼的演出主要是穿著極少的衣服，在籠子內或外，配合主人的命令或應觀眾要求隱約展露其私密部位。有時，也搭配鈴鼓，哼唱些家鄉的歌謠。根據報紙標示的展出時間，莎哈一天工作長達十小時。這種不人道的待遇，很快就被倫敦一個主張解放奴隸的團體 African Association 注意，而引起一場司法訴訟。在審判過程中，會講少數荷語的莎哈·巴特曼留下一些自述和證詞。她表明她和主人之間存在著契約關係，並表示希望拿到演出收入的一半後再回家鄉。由於莎哈表示演出是出於自願，又拒絕了協會免費送她返鄉的提議，這個事件最後也就不了了之。不過，或許是這場官司使莎哈在倫敦的演出蒙上陰影，再加上當地觀眾的新鮮感不再，H. Cezar 因此帶她離開首都而轉往其他城市發展。儘管他們的蹤跡出現在英國沿岸的許多都市，1811 年到 1814 年間所留下的資料卻十分稀少。

⁷ François-Xavier Fauvelle-Aymar, *L'invention du Hottento*, pp. 128-134.

1814 年，巴特曼被轉賣給一位在法國經商的英國人 Henry Taylor。同年 9 月被帶到巴黎後，旋即又被 Taylor 轉賣給一位專門從事動物表演的法國馴獸師 S. Réaux。一直到 1815 年 12 月底病逝時，莎哈·巴特曼一直在市中心熱鬧的聖何諾黑路（rue St. Honoré）演出。不過，根據一些傳言，她也曾經出現在某些貴族的沙龍。在 Henry Taylor 將巴特曼帶到巴黎的初期，他曾去函給自然史博物館（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的教授們，邀請他們來看巴特曼的首演。不過當時這些學者因為受到政局變動的影響，並未特別留意這個邀請。巴特曼的演出受到大眾矚目後，1815 年 3 月間，由動物學家 Etienne Geoffroy St. Hilaire 出面安排，莎哈·巴特曼被帶到自然史博物館停留三天，供多位學者觀察和描繪。不過在那次觀察當中，由於莎哈·巴特曼的拒絕，學者們並沒有如願以償地看到傳說中的「霍騰托圍裙」（tablier hottentote、Hottentot apron），也就是霍騰托女性特別肥厚的陰唇前部。不過，也許是在那次的接觸後，學者們與 Réaux 達成某種協定。巴特曼因病死亡後，遺體很快地就被運往博物館。先前，由於弊端不斷，頒佈於 1813 年的一項法令其實已經規定屍體解剖只能在醫學院或市內最大的醫院慈悲醫院（l'Hôpital de la Pitié）兩個地方進行。在教授們的要求下，巴黎警局局長同意網開一面，讓莎哈·巴特曼的屍體在博物館的解剖實驗室中接受解剖。在解剖前，居維業先用其軀體製作了一個實體大小的石膏模型。然後將其腦和性器官的部份切割下來，性器官的部份先做了幾個蠟像標本，最後分別保存於浸有化學藥劑的玻璃罐中。其頭骨和身軀骨架去肉處理後另外保存。這些遺骸標本起初存放在自然史博物館中，在 1937 年原來的托卡得羅民族學博物館（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翻新成人類博物館（Musée de l'Homme）後，被移至該館展示。直到 1970 年代中期，批評聲浪漸起，館方遂決定將之存放於倉庫，從此不再公開展示。

1994 年，南非政局丕變，曼德拉當選總統，國內許多黑人族群也紛紛興起正名和還原歷史的運動，藉此強調自己原住民的身份和認同以及所屬族群的悠久傳統和獨特性。其中有幾個團體，尤其是格里瓜族人（Griquas），便宣稱莎哈·巴特曼乃其族先人，要求曼德拉出面向法國爭取遺骸歸鄉。根據該族的習俗，族人死後應該在其出生地下土安葬，而莎哈·巴特曼的遺體一直沒有被安葬，其人是無法安息的。當時的法國總統密特朗雖然口頭應允曼德拉的要求，但責成相關單位處理後，這件事卻一再遭到延宕。2000 年底，南非駐法大使正式以公文向法國政府提出要求，也沒有得到適當回應。博物館負責單位以國有文物不可轉讓

的規定為由，拒絕歸還。法國文化官員擔心的是，此例一開，往後各國將陸續向法國索討文物。在國際輿論，尤其是南非一些知識份子的積極介入下，法國國會議員 Nicolas About 提出立法解決的方案。2002 年 2 月 21 日法案正式通過。其中特別申明：因為巴特曼的遺骸如今並沒有科學研究的價值，所以可以歸還。懸置多時的歸還案終於落幕。2002 年 8 月 9 日，在前後兩任總統曼德拉和牟貝其在場觀禮的隆重氣氛下，南非政府依當地的傳統習俗為莎哈·巴特曼舉行葬禮。

莎哈·巴特曼的表演在十九世紀初曾經引起廣泛的討論，其風行的程度，使她幾乎成為土著女性在西方世界展示的縮影。當時，除了在許多報紙上的單幅漫畫上可以看到她被誇張的形象之外，在英國還流傳有一首以她為主題的詼諧敘事小曲⁸。當她在法國展出時，一家新開幕的高級縫紉用品店就以「黑色維納斯」為店名來吸引顧客⁹。1814 年 11 月，在巴黎上演的一齣滑稽歌舞劇也以她為標題¹⁰。相對於十九世紀上半葉這個人物被討論的盛況，有關她的話題在二十世紀的人類學界卻逐漸被遺忘。只有在其逝世（解剖）一百週年時，人類博物館當時的館長 René Verneau 想起這個名聞遐邇的非洲維納斯和她的特徵，做了一些片段的回顧¹¹。但是 Verneau 只是重覆一個世紀以來累積的種種偏見，並沒有因為當時的人類學理論內涵改變而重新檢視這個案例。

2. 後世重新發掘的過程

對於莎哈·巴特曼的一生經歷，在其南非故鄉可找到的記錄很少，倒是在她所巡迴演出的英、法兩國可以找到相關的文字和圖像記載。而這些記載中，能夠回溯她真正的私人生活和想法的幾近於零。目前學者找到的資料，除了報紙上有關演出的報導之外，就是受洗證明、法庭筆錄、自然學者觀察和解剖她之後所留下的報告。也就是說，像巴特曼這樣的一個歷史人物，如果沒有「事件」發生時就沒有留下痕跡。

目前對於其生平經過的瞭解，是在 1940 年代末，一位南非學者 Percival Kirby

⁸ Raymond Toole Stot, *Circus and Allied Arts: A World Bibliography 1500-1970* (Derby, Eng.: Harpur [distr.], 1958-1971), vol. 2, p. 152 中提到一首題為“The Hottentot Venus: A ballad”的歌謠。

⁹ Gérard Badou, *L'énigme de la Vénus Hottentote*, p. 123.

¹⁰ François-Xavier Fauvelle-Aymar, *L'invention du Hottentot*, p. 324。此劇劇名為 *La Vénus Hottentote, ou haine aux Françaises, vaudeville en un acte*。

¹¹ René Verneau, “Le centième anniversaire de la mort de Sahah Bartmann”, *L'anthropologie*, 27 (1916), pp. 177-179.

試著從十九世紀初報紙雜誌的相關報導中建立起來的¹²。雖然Kirby初始的報導性文章引起當時人類博物館的副館長André Schaeffner的注意並提供給他多項資料，Kirby的文章並沒有引起其他人進一步的研究。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一些有關西方世界中的黑人印象的研究，也多少注意到霍騰托維納斯的例子。另一方面，少數有關歐洲雜耍、馬戲團和各種大眾娛樂表演的研究，也指出異族，尤其是非洲黑人，在歐洲秀場所佔的地位¹³。不過這些研究都未能指出為何霍騰托維納斯在西方人類學史的某個時刻曾經引起那麼大的興趣和討論。也許是受到（後）殖民研究盛行的影響，1980年代起相關的研究漸多，而這些研究也試圖朝這個方向進行解析。Mathias Guenther¹⁴的文章藉著對媒體、學界、傳教圈相關論述的交叉分析，指出三個世紀以來布希曼人從野蠻到無害的和平形象之轉變。Stephen Gould¹⁵在他為《自然史》月刊長期主筆的專欄中討論此問題所切入的角度和得到的結論與Sander Gilman¹⁶、Robert Gordon¹⁷等人一致。歸納起來，這些學者都認為，霍騰托維納斯所引起的熱烈討論正反映了十九世紀初期學界兩方面的興趣：一方面是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人獸界線劃分的問題；另一方面是性別區分和女性性慾的問題。有關人類起源和人種分類的問題，由於「存有之鏈」（chain of beings）¹⁸的觀念在當時的盛行，霍騰托人被認為就是那個介於人類與類人猿之間的中介人種，那個大家在尋找的「缺環」（missing link），而為這種連續性的假設提供一個暫時滿足的答案。這也是為何在後來的人種高低階層之分時，霍騰托／布希曼族人時常被認為是所有已知人種中最低等的。至於性別歧視的問題，由於當時學界有從器官外型探知內在功能的傾向，霍騰托女性之特殊性

¹² Percival Kirby共發表了四篇相關文章，分別是：“The Hottentot Venus”, *Africana Notes and News*, 6.3 (1949), pp. 55-62; “More about the Hottentot Venus”, *Africana Notes and News*, 10.4 (1953), pp. 124-134; “The ‘Hottentot Venus’ of the Musée de l’Homme, Pari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50.12 (1954), pp. 319-322; “A further note on the ‘Hottentot Venus’”, *Africana Notes and News*, 11.5 (1954), pp. 164-166.

¹³ 例如Raymond Toole Stot, *Circus and Allied Arts: A World Bibliography 1500-1970*。

¹⁴ Mathias Georg Guenther, “From ‘Brutal Savages’ to ‘Harmless People’: Notes on the Changing Western Image of the Bushmen”, *Paideuma*, 26 (1980), pp.123-140.

¹⁵ Stephen Jay Gould, “The Hottentot Venus”, *Natural History*, 91.10 (1982), pp. 20-27.

¹⁶ Sander L. Gilman, “Black Bodies, White Bodies: Toward an Iconography of Female Sexuality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rt, Medicine, and Literature”. *Critical Inquiry*, 12 (1985), pp. 205-242.

¹⁷ Robert J.Gordon, “The Venal Hottentot Venus and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frican Studies*, 51.2 (1992), pp.185-201.

¹⁸ 這個可以上溯至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概念，指的是宇宙萬有完滿、連續、階序的特性，在文藝復興時期和啟蒙時代都將這些概念加以延伸應用，對於此概念的整體背景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當代對此主題的代表性研究作品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1936)。

器官外型，引起學者對其功能上的好奇。而這背後還涉及女性性慾問題。霍騰托女性性器官的形狀特殊被認為是行為放蕩的結果或傾向放蕩行為的一種生物器官表現，甚至是接近動物性的一種證據。而當時對於歐洲妓女的生理研究，認為縱欲的行為會表現在生理上，譬如豐滿身材、特殊頭形、肥臀、性器官構造等等都是常被論及的議題。在討論此類議題時，非洲女性，尤其是霍騰托女性往往是最常被提到的例證。綜合這兩方面的興趣，使得霍騰托女性特別受到當時學界的注意。

從這些已經累積的研究成果再來看美國後殖民研究、女性研究學者Tracey Denean Sharpley-Whiting晚近以此為題所出版的著作¹⁹，便可以看出繼續依循西方之異族形象再現（representation）的研究路徑，可能無法再為這個題目提供新的視野。在這本論文中，第一章即是討論黑色維納斯的案例。作者將評論的對象集中放在居維葉解剖後所做的報告上，將之視為master text來處理，忽略了這樣一篇報告是居維葉寫過的近百篇鑑定報告中的一份，而當時一般讀者接觸到這篇文章其實是在其胞弟Frédéric Cuvier與其同事Etienne Geoffroy Saint-Hilaire合編的《哺乳動物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 des mammifères*）三大巨冊中，一一描述上百種哺乳動物特徵中讀到的。作者藉著分析這樣一篇文章，批評文中所反映的西方帝國種族歧視的心態，其實並沒有比Mathias Guenther或Sander Gilman提出更多新見解。反之，若將此案例放回當時的相關知識的生產網絡和物質基礎中做更多的分析，也許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這個事例發生的可能性條件（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進而重新思考：如果我們放棄以今日之是論昨日之非的方便法門，又該如何處理殖民時期留下來的知識遺產。

II. 十九世紀法國自然史研究的幾個主要面向

1. 思想背景：從人類的自然史到顱骨學

儘管對異己的好奇和偏見自上古就存在，但直到地理大發現之後，西方才對世界生物的多樣性產生強烈而持續的求知欲望。在十八世紀後半期的法國，由於林奈（Carl von Linnaeus）學說的傳入與布豐（Georges-Louis de Buffon）的自然史巨著的完成，一個以更有系統、更全面的方式去探討人類為何的想法逐漸成為相關學者的共識。舉凡解剖學、生理學、古生物學、考古學、民族學、心理學、

¹⁹ Tracey Denean Sharpley-Whiting, *Black Venus : Sexualized Savages, Primal Fears, and Primitive Narratives in French* (Durham, NC: Duke UP, 1999)。

語言學都被包含在一個綜合的人類科學（Science de l'Homme）的藍圖裡，而這些現今分科清楚的知識在當時也僅是面目模糊，還在摸索本身定義、方法和範圍的新興科學。其中，人種研究正是一個主流的課題。它既屬於上述任何一門學科的研究範圍，同時似乎也可以獨立成爲一個專門的學科：人種學（raciologie, science of races）。儘管在人類起源的解釋和研究方法上彼此的見解歧異，林奈與布豐都分別在他們所建立的知識系統中，爲以外在形貌爲標準的人種分類提供完整的基礎。於此同時出現的許多種學說及著作則試圖以更科學、更精確的方法來訂定人種分類的標準。顱骨學的出現和確立正充分反映了這股潮流。從Louis Daubenton（1716-1800）在1765年以人類頭骨觀察爲基礎從事人類與四足動物（尤其是猿類）比較後所發表的第一篇相關研究開始，經過Peter Camper（1722-1789）建立起臉部角度測量的雛形，一直到德國生理學家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正式建立系統研究²⁰，顱骨在鑑別人種上的重要性，在經過不斷辯論和修正後，在十九世紀初已具備相當穩固的理論基礎。此時投入研究的Etienne Geoffroy St. Hilaire（1722-1844）和居維業（1769-1832）則被後人視爲是這個領域集大成者。這期間尚有旁支學說的出現，如以Jean-Gaspard Lavater（1741-1801）的學說爲主的相面術（physiognomy）和以Franz-Josef Gall（1758-1828）爲核心人物的顱相學（phrenology）。雖然這兩派後來都遭居維業等人駁斥，而在此領域的發展史中被貶至邊緣位置，但它們的加入也證明了當時在這個領域中的確出現百家爭鳴的盛況。顱骨研究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大的關注和投入，一方面是因爲顱骨測量所得到的數字被認爲比以往從膚色、髮質、體態等鑑別標準更客觀，另一方面也是因爲這背後隱含有藉由頭顱大小比例和腦容量的關係來判斷智慧高低、甚至訂出道德文明與野蠻獸性之間的分際線等超乎技術層面的問題，其結論攸關於人類文明之起源與興衰的重大課題。這種企圖從生理外在表徵的客觀研究去探索人類內在智慧、精神、道德表現高下的作爲在整個十九世紀的人類科學研究中屢見不鮮。從十八世紀後期到十九世紀的前三十年，顱骨測量在歷經一次又一次、屬於不同層次的辯論後確立其理論基礎。往後半個世紀所出現的只是在技術層面的討論和改進，例如確立測量基準點、提高測量工具和方法的精確度、引進統計學的輔助等等，幾乎沒有學者出來質疑這些研究的認識論基礎²¹。在一八八〇年代開始陸續出現的人類學歷史回顧的著作中，作者們都

²⁰ Blumenbach根據顱骨大小，首次把人類分成五大種系：高加索人種、蒙古人種、衣索比亞人種、亞美利加人種、馬來亞人種。

²¹ Claude Blanckaert, “‘Les vicissitudes de l'angle facial’ et les débuts de la craniométrie (1765-1875)”,

提醒讀者：顱骨學並不等於（體質）人類學²²。這樣的提醒也間接證實顱骨學在廣義的人類學研究上一度曾經佔有的主導地位。莎哈·巴特曼頭骨的加入，為居維業的標本收藏增加一個霍騰托女性的頭顱標本。居維業死後亦捐出自己的頭顱供給同僚做研究，並成為後來從醫生轉為專職的體質人類學家Paul Broca（1824-1880）的得意收藏的一部份。而Broca本身也交代學生在他死後將其顱骨加入收藏，以供後人研究。我們從這樣的舉動中可以看到當年的學者對不斷擴大標本收藏、進行比較研究、獲得可靠統計數據的狂熱，而很難說是種族歧視的直接證據²³。不過，不同的是，居維業和Broca是自願為科學之精進而捐贈遺體，而莎哈·巴特曼卻是在沒有經過告知和自主選擇的情況下，成為法國科學材料的部份收藏。

這種對系列收藏重要性的信仰使得法國自然史研究在十九世紀前期就累積了驚人的標本收藏數量，也展現出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也是因為對系列收藏、整理、分類等工作的過度依賴，使得實驗生理學研究在以前類工作為專長的自然史博物館（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遲遲無法展開，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在其他學術機構的競爭下，這個歷史輝煌的機構甚至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學術發展困境²⁴。

2. 材料來源：人員的動員和實際操作

傅柯在其《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中，將居維業標舉為生物學上認識論轉變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從中可看出十九世紀初期的自然史學者已經不滿足於以往的外在型態描述和分類方法，而企圖進一步對組織、運作、內部構造進行積極瞭解²⁵。不過，綜觀當時從自然史研究所發展出來的人種研究之基礎工作內容

Revue de synthèse, 4.3-4 (1987), pp. 417-453.

²²例如Paul Topinard, *Eléments d'anthropologie générale* (Paris: Adrien Delahaye et Emile Lecrosnier, 1885), p. 127.

²³ 其實在這些顱骨學家中不乏有反奴隸制者。當然，許多研究也已經指出，許多在當時主張廢除奴隸制的人也一樣帶有種族偏見。

²⁴有關此博物館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所面臨的困境，可參考Claude Limog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of Paris, c. 1800-1914", in Robert Fox, George Weisz (eds.), *The orga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France 1808-19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1980, pp.211-140。

²⁵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Paris: Gallimard, 1966), pp. 275-292. Foucault此舉乃企圖從另一角度來反駁以往觀念史在討論拉馬克(Jean-Baptiste Lamarck)與居維業的對峙時，由於認為拉馬克的學說預示了後來達爾文的演化論，因此有被埋沒的先驅的地位，而將持反對看法的居維業定位成反動保守的人物。對於Foucault這樣的論點，研究自然史的學者雖不反對，但也提醒現在學者在討論從自然史到生物學的轉變時，必須避免將

可以發現，學者大部份的活動仍是在觀察、描述、歸類及命名。

事實上，在自然史領域裏，十八世紀後半葉起出現兩個趨勢，一方面是學者愈來愈重視標本收藏和分類系統的建立，另一方面，整個知識生產的組織有愈來愈集中化的趨勢²⁶。正式在這樣的背景下，前身為建立於 1635 年的皇家藥用植物園（Jardin royal des plantes médicinales），而在 1793 年被國有化並改制成立的自然史博物館（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逐漸鞏固了它作為整個材料蒐集網絡的「計算中心」（center of calculation）²⁷的地位。對於多數留在知識生產中心的學者而言，運用各種管道以豐富其標本收藏原本就是其學術活動的一部份。林奈之所以能夠建立一套相當完備的分類系統，其中一部份原因即在於他懂得維繫一個相對可靠的材料來源網絡。在這方面，他的理論追隨者也學習他的操作模式。布豐的自然史巨著中許多例子則是從他所習讀的旅行探險家之遊記見聞中擷取出來的；但是由於材料的品質參差不齊，也使他為此飽受批評。而前面所提到的Blumenbach，他之所以能夠超越前人學說而被居維業等人認為是顛骨學的奠基者，也是因為他所提出的論據是建立在他所收集的兩百多個頭骨的比較研究上，這在當時算是數目龐大的一個收藏²⁸。從這些著名的例子都可以看出，當時的學者都體認到，要做出完善的研究成果，豐富的標本收藏是必要條件。雖然對許多學科而言，收藏多寡與研究成果的好壞未必成正比，對於自然科學研究者而言，這種增加收藏的狂熱直到二十世紀才受到檢討。

儘管對標本收藏如此依賴，當時大部份的自然學者並沒有因為想多蒐集世界各地的標本而踏上旅途。事實上，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專業的自然學者自身前往遠方觀察和採集研究資料的人數才開始逐漸增多，並且成為其專業標準的認定之一。在這之前，絕大多數的自然學者主要依賴一些業餘的自然學愛好者的遠征所得來擴充其研究材料的收藏。當時法國的學者一般稱這些幫忙採集和運送標本的旅行者為「旅行家兼自然學者」（voyageurs-naturalistes）。這樣的稱

當時學者某些自立學術權威的作法照單全收的危險。參見James A. Secord, “The Crisis of Nature”, in Nicholas Jardine, James A. Secord, and Emma Spary (eds.),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6), pp. 447-459.

²⁶ Marie-Noëlle Bourguet, “La collecte du monde : voyage et histoire naturelle (fin XVII^e siècle-début XIX^e siècle)”, in Claude Blanckaert et al. (eds.), *Le Muséum au premier siècle de son histoire* (Paris, Editions du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1997), pp. 163-196.

²⁷ 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pp. 215-257。國內有關拉度此概念的介紹，可參見李尚仁，〈收藏的帝國：博物館作為科學研究機構的歷史〉，《博物館學季刊》，17.2（2003）：pp. 37-43。

²⁸ Jean-Luc Chappey, *La Société des Observateurs de l'Homme (1799-1804): Des anthropologues au temps de Bonaparte* (Paris: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 2002), p. 259.

呼其實是相對於當時數目極少的，專程爲了收集材料而踏上旅途的專職自然學者（*naturalistes en voyage*）²⁹。在「旅行家兼自然學者」這個稱呼中，旅行者的成分多過於自然學者的成分，而事實上其旅行的機會主要來自於其主業的需要，而非爲了自然採集而專程出發。在十六、十七世紀，傳教士和船醫是最主要的資料提供者。隨著地理大發現的進展，尤其是隨著人種學在十八世紀中葉的興起，本身並不前往遠地的學者逐漸發現必須進一步掌握材料收集的過程。除了先前的兩群人士，十八世紀的「旅行家兼自然學者」又陸續增添了幾種來源。首先，自然史博物館開始試圖培養稍具專業知識的年輕學者，並且爲他們爭取長途旅行的經費，以求取得更可靠的原始材料。其次，海軍中負責醫務部門的軍官也加入行列。此外，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隨著殖民事業的大幅擴展，幫忙採集各類生物標本也成了一些陸軍軍官的主要副業。當然，這期間，有一些自然史博物館的學者自己也開始加入遠征隊到「田野」³⁰去，如Geoffroy就參加了拿破崙的埃及遠征隊。不過，比起當時學者的整體數量而言，這樣的學者仍屬少數。

爲了提供給這許多訓練程度不一的業餘自然學工作者在遠地收集標本的一個標準工作流程，自然學者開始撰寫「工作指南」（*instructions*）。以法國爲例，這類從一頁到數頁不等的工作指南在 1770-1800 年間大量出現³¹。其中較具規模並廣爲流傳的是在 1800 年由人類觀察家學會（*Société des Observateurs de l'Homme*）出版的兩份工作指南。爲了支援Nicolas Baudin帶隊的澳洲勘查遠征隊的準備工作，人類觀察家學會出面邀請其主要成員撰寫工作指南³²。最後真正完成的兩份工作指南之中的一份便是由居維業執筆寫成的《關於探討各人種在解剖學上之差異所應進行之研究工作要點》（*Note instructive sur les recherches à faire relativement aux différences anatomiques des diverses races d'hommes*）³³。在這份文件裡，居維業將他所設想得到的採集步驟和注意事項詳細地列舉出來。對於自認爲「坐擁世界最棒的收藏」而對親身到「田野」工作的必要性相當不以爲然的

²⁹ Yves Laissus, “Les voyageurs naturalistes du Jardin du roi et du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essai de portrait-robot”,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34.3-4 (1981), pp. 259-317.

³⁰ 由於「田野」在當時知識生產脈絡中的位置與操作內容和今日學界使用此詞時所隱含的意象相差甚遠，此處故將之置於引號內，以免混淆。

³¹ 見Marie-Noëlle Bourguet, “La collecte du monde: voyage et histoire naturelle (fin XVII^e siècle-début XIX^e siècle)”, pp. 166-171.

³² 參見Jean-Luc Chappey, *La Société des Observateurs de l'Homme*, pp. 246-262.

³³ 此工作指南全文可見於Jean Copans, Jean Jamin, *Aux origines de l'anthropologie française : Le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s Observateurs de l'Homme en l'an VIII* (Paris, Le Sycomore, 1978)之附錄，pp. 173-176。

居維業³⁴於此充分表現出他想遠距離指導採集者操作，以期得到真正可用的材料的企圖³⁵。隨著這個作法逐漸普及，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希望讓每個有可能為自然史之發展貢獻一己之力的人在出發時都帶著一份工作指南。從 1824 年開始，該機構有計畫地請各科教授們編撰工作指南，供有興趣的人索取。此外，博物館本身也在 1818 年嘗試設立旅行採集者班，企圖以更有系統的方式訓練旅行採集專家；但是在頭一期合格的兩位年輕學生參加遠征卻意外身亡後，這個嘗試就此中斷，一直到 1893 年才又恢復。從這中斷現象可以看出，對於博物館的主事者而言，原先鬆散的資料蒐集運送網絡雖有不夠精確的弊病，但是博物館本身起碼不需負擔太多育才夭折的投資損失。而在十九世紀末重拾這個訓練計畫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殖民團體的鼓勵，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整個博物館的學術地位受到新大學系統的競爭而有邊緣化的趨勢，主事者期望從投入殖民環境的科學研究來獲得政府的重視和資源，從而挽回頹勢³⁶。

由這種種作為顯示，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葉，對人類自然史或廣義人類學有興趣的學者企圖透過散發工作指南或安排某種職前訓練的方式，將人員從出發到返回博物館的這個材料收集及運送過程的許多環節加以標準化、規格化。而隨著殖民版圖的擴大和帝國預算的投入，到了十九世紀末期，這樣的材料收集和運送網絡已經頗具規模，不僅所到達的材料來源地愈來愈多，運送的距離愈來愈長，運送過程愈來愈安全，更重要的是，透過處於「計算中心」的學者們的訓練、校準和獎勵等種種機制，帶回來的材料愈來愈精確，愈來愈立即可用。

撇開理想與實際之間的落差問題不談，即使工作情況能夠按照原先規劃的理想來進行，我們可以想像這樣的分工模式仍對某些學者的工作有所限制。事實上，在十九世紀初，由於交通工具不發達，旅程耗時費日，身兼數職的探險採集者所帶回來的往往是骨頭標本。像居維業這樣安居型的學者很少能親自做活體觀察，只能在屍骨上進行判斷，這也是為什麼他被戲稱為「停屍間的大師」(master of the charnel house)³⁷。於此可以想見，馴獸師Réaux所提供的莎哈·巴特曼對

³⁴ 有關居維業不認為自然學者有必要親自到遠地做觀察採集的想法，參見Dorinda Outram, “New Spaces in Natural History”, in 0, pp. 249-266.

³⁵ 事實上，居維業在此次的遠征隊中就安插了一位年輕的、學醫出身的自然學者François Péron (1775-1810)，經過將近三年(1800-1803)的工作，Péron帶回給居維業二千多件的骨骼標本。居維業後來出版的書中便大量引用這批材料。參見Jean-Luc Chappey, *La Société des Observateurs de l'Homme*, p. 290。

³⁶ 見前引文Claude Limog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of Paris, c. 1800-1914”。

³⁷ Dorinda Outram, *Georges Cuvie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84), p. 183.

自然史博物館從事動物、人種研究的學者而言是千載難逢的親眼觀察的好機會。事實上，一直到莎哈·巴特曼出現之前，對此議題有興趣的自然史家、體質人類學家大多只能依賴旅遊者的文字描述和部分圖片來做假設，極少有人親自到南非當地觀察。但是有關霍騰托女性陰唇肥長的傳言卻始終不斷，甚至有人認為那是在別的人種女性身上沒有一個特殊器官。所以居維業在其報告的一開始就說：「在自然史上，沒有什麼比霍騰托女性的圍裙更有名的，同時，也沒有比它引起更多爭議的」³⁸。在這個報告中，居維業否定了獨立器官說，而證實了那只是陰唇過度發展而形成的特殊現象。因為這個實體觀察，居維業的這篇報告為以往的爭論暫時劃下句點，也成為日後學界相關討論的主要參考根據。

3. 知識生產與流通：學會、博物館與專業化問題

從 Dunlop、Cezar、Taylor、Réaux 這些把莎哈·巴特曼從南非帶到歐陸展示的這些人的作為，以及他們主動與博物館人士接洽的動作來看，船醫、動物進口商、馴獸師與自然學者已有某些接觸的管道或共同分享的知識背景。他們不僅耳聞過關於「霍騰托圍裙」的傳言，清楚知道展示一個霍騰托女性身體可以獲利之處，甚至也瞭解：透過自然學家的鑑定有可能為自己的貨品加值。當時人體奇觀秀從宮廷逐漸流傳到民間，競爭日益激烈，其中且不乏有魚目混珠者。對於業者而言，一旦有了專家的背書，他們就可以在同行間做市場區隔，並因此可能求取較高的利潤。另外，由於他們與動物長期接觸而累積的經驗，也讓他們可以與學者交換心得，尤其是當學者必須進一步瞭解採集過程的詳細情況時。事實上，從他們提供材料的角度來看，他們可以算是上述的知識生產原料的蒐集網絡的一員。另外，他們之中亦不乏有人在多方提供學者有興趣的材料後，專業知識得到學者的肯定，而在整個知識生產活動裡取得一席之地，而不只是一個純粹的材料提供者。

事實上，十九世紀數量繁增的各種學會就是一個社會上不同階層因對某一主題之興趣而交流聚會的場所³⁹。由於政局的混亂，當時建制成熟的知識生產機構

³⁸ Georges Cuvier, "Extraits d'observations faites sur le cadavre d'une femme connue à Paris et à Londres sous le nom de Vénus hottentote", *Mémoires du Muséum*, 3 (1817), p. 259。居維業此篇文章後來又被收錄在其弟Frédéric Cuvier與Etienne Geoffroy Saint-Hilaire在1824年合編出版的《哺乳動物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 des mammifères*)中，受到更多人的引用。

³⁹ 以法國人類學為例，由於在整個十九世紀一直沒有得到大學系統的承認，在大學中無法取得立足點，學會成為最主要的推動此學科發展的機制。參見Elizabeth A. Williams,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Isis*, 76/283, sept. 1985, pp. 331-348。至於學會在十九世

和教學機構的數量固定，而且這些老機構認可新知的速度緩慢。在許多新知識領域中，學會因此扮演了知識生產、傳播與交流的角色。某些實用性較強的學會也負有提供專業諮詢、鑑定的功能。從其中構成的成員包括學者、政界人士、貴族、文人、社會專業人士來看，可以知道，專業與業餘之間的分界線在歷史上並非固定不變的，而往往是隨著參與其中的各個群體互相定義、不同議題上的爭論結果、學者專業形象的社會認同等等因素不斷調整而得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居維業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例子。在居維業正式進入自然史博物館的時候（1795年），這個以研究為主的機構本身只有十二個正式教席。由於彼此的專業領域分野、研究取徑不同，對於某專科的發展方向看法不一，博物館在學術生產上其實並不能算是一個同質性很高的機構。除了他在自然史博物館和其他建制完成的學術機構的職位外，從1795年到1803年之間，居維業同時參與了近十個大小不同的學會⁴⁰。雖然某些學會內的成員與主要學術機構的成員或有重疊，學會的成員規模和彈性的運作方式，卻使得像居維業這樣的學者得以接觸到其所屬機構之外的其他自然學愛好者。某些時候，他與一些學會成員的關係比他與博物館內同事的關係更密切，在其專科的討論上可能也更多。舉一個前面提過的現成例子，他所寫的工作指南便是在人類觀察家學會的要求下寫成，而不是在自然史博物館的背景裡產生的。而後世研究者也認為，居維業靠著在學會的刊物上發表的文章建立了其專業聲譽⁴¹，也靠著學會裡建立起來的交誼得到了許多免費的標本收藏⁴²。在居維業接觸到巴特曼的個案之前，他在已經投入十多年時間的化石動物研究上正好告一段落。從1796年開始到1812年完成四大冊《化石骨骸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ts fossiles*），居維業在這個領域已經建立起一個動員化石標本或其替代品的國際網絡。而這些主要歸功於他在各種機構和學會刊物出版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他除了發表暫時的研究成果外，並呼籲國際間（主要是歐洲國家）對該主題有興趣的人士，將他們收藏中有待鑑定的標本以精確的圖樣寄給他，他將

紀的法國知識、文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見Jean-Pierre Chaline, *Sociabilité et erudition : les sociétés savantes en France* (Paris, Editions du CTHS, 1998)中有完整的分析。英文出版中較簡要的分析，可參考：Robert Fox, “The *savant* confronts his peers ;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France, 1815-1914”, in Robert Fox, George Weisz (eds.), *The orga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France 1808-1914*, pp. 241-282.

⁴⁰ 參見Dorinda Outram, *Georges Cuvier*, p. 211, note 21. Outram所提到的學會有：Société philomatique、Société d’histoire naturelle de Paris、Société philotechnique de Paris、Société libre des pharmaciens de Paris、Société de santé de Paris、Société de médecine de Paris。

⁴¹ 同上。

⁴² Martin Rudwick, “Georges Cuvier et la collecte d’alliés internationaux” in Claude Blanckaert et al. (eds.), *Le Muséum au premier siècle de son histoire*, pp. 591-606.

回報以一手的鑑定結果，並且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一一感謝這些同好。而從居維業在文章中所感謝的人士，後世研究者得以回溯其交流網絡的地理分佈。

儘管如此善於運用各項機構資源，處於這個性質交錯的知識生產流通網絡中的居維業卻又是一個非常有意識要將專業科學與通俗科學（popular science）劃清界限的人⁴³。這位人稱「知識界的拿破崙」就鼓勵同儕對人種研究要有勇氣做精密的描述，也就是說，即使文章內容因此枯燥無味而讓讀者覺得無趣也在所不惜。而且爲了建立其學術權威，他常常將專業科學的利益與一般大眾的利益對立來討論，而認爲前者應該總是比後者重要。

瞭解這樣的立場後，再來看居維業在研究和教學上所使用的不同的展示策略，便可以發現他其實並不輕忽通俗科學在他學術活動裏的重要性。從Outram對居維業的研究中所提供的線索，可以發現居維業是一個十分注重材料及成果呈現與知識生產本身關係的一個學者。他不僅從他陳列的方法—據Outram的說法，那是生理學的方式而不是傳統的動物學的或僅注重視覺美感的方式⁴⁴—來挑戰當時既有的研究，也認爲館內以往以書齋（cabinet）爲擺放標本的空間，而使得陳列數量和方式必須遷就空間限制的作法是有問題的。從進入自然史博物館工作後，他就積極建立一個符合其比較解剖學知識藍圖的陳列方式。他放棄書齋的擺放模式，另外闢立專門的陳列室（gallery）來排列標本，並且隨著標本數量的增加和種類的細緻化來調整排列的順序。到他退休時，他在博物館總共擁有十五間陳列室來呈現他在比較解剖學上的成績⁴⁵。他在國際學界的學術威望之建立，除了他發表的學說之外，有一部份也來自於他的標本收藏和令人讚嘆的秩序陳列。事實上，此處的陳列展示可以歸屬於他進行比較解剖學實際操作的一部份：系列化的陳列不但讓他容易進行比較研究，也較易察覺收藏中還缺漏的材料證據，由此可進一步要求往這些地方遠征的旅行者爲他尋找缺乏的標本。這也是博物館作爲一個資料集中的「計算中心」的基礎功能之一。

在教學上，居維業則發展出一套講解與示範的方式，可以說是屬於學術活動

⁴³ 參見Jean-Marc Drouin, and Bernadette Bensaude-Vincent, “Nature for the People”, pp. 411-413; James A. Secord, “The Crisis of Nature”, p. 449。二文皆收錄於Nicholas Jardine, James A. Secord, and Emma Spary (eds.),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⁴⁴ 參見Dorinda Outram, *Georges Cuvier*, p. 176。對此，Phillip R. Sloan有不同看法。這位研究者參考Richard Owen在1831年的看法，比較Cuvier和受到其影響、卻發展出自己另一套作法的John Hunter的陳列方式，認爲Cuvier的陳列觀念仍是屬於自然史式的而不是生理學式的：Phillip R. Sloan, *Le Muséum de Paris vient à Londres* in Claude Blanckaert et al. (eds.), *Le Muséum au premier siècle de son histoire*, pp. 607-634。

⁴⁵ 參見Dorinda Outram, *Georges Cuvier*, pp. 178-180.

裏演出展示 (mise en scène) 的部份。作為一個研究機構而不是教學機構，自然史博物館教授的課程通常是在夏季三個月中舉行，而且是開放給所有有興趣的學生和社會大眾、不頒發文憑的課程。在居維業的課堂上，有同時在巴黎醫學院修習比夏 (Xavier Bichat) 課程的醫科學生，也有對異土動物新知有興趣的貴族婦女，有時一堂課的學生人數多達三百人。面對這樣知識背景殊異的聽眾，居維業體認到必須以視覺材料而非只靠口頭描述來說明他的理論。他並且從當時一個知名的演員François-Joseph Talma (1763-1826) 的表演方式中得到靈感，對講台做特別的設計，方便他展示標本，並讓他得以隨時在後面的板子畫圖講解，讓聽眾對他解說的內容能一目了然⁴⁶。由此推測，莎哈·巴特曼被解剖前後製作成三種不同型態的標本，並非偶然，而是為了研究或示範說明等不同目的之用。在居維業的解剖觀察後被定案的「霍騰托圍裙」問題，使得莎哈·巴特曼在人類學的發展史上佔有了一定的地位，而不再單純只是眾多雜耍藝人中的一個。

不過，在這種知識生產和傳播的邏輯中，莎哈·巴特曼作為一個個人其實並不存在，她的重要性在於她可以在學者研究和收藏的人種系列中成為代表霍騰托女性的一個人種類型 (type) 樣本。

這樣的人種類型在經過學者的分類和鑑定後逐漸確定下來。事實上，這些人種一活的或是死的一在被帶離他們原來的生存環境後，就已經和它們原來所屬的那個時空割裂。他們在西方世界存在的意義不是來自於他們原來的社會歷史脈絡，而是由自然學者所建立的分類系統中去賦予。作為一個標本，它們在學者的分類收藏系列中雖佔有一席之地，其排序卻不一定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新發現的加入、人種認定標準的調整、基礎理論的推翻或突破等因素，其相對位置原本是有可能改變的。換言之，隨著學者的分類理論的改變，在這人為的自然秩序中，每個標本的意義是可能被重新定義的。然而透過十九世紀大眾傳播普及的簡化過程，透過動物園、博物館、博覽會乃至馬戲團的土著秀，加以報刊、書籍的多層傳送，一種特徵集中的人種刻板印象則逐漸獨立繁衍，不再需要原來的那套一即使是遭到簡化的一意義系統來支持。所以即使是學界已經修正或推翻原來的理論，民間對各種族的印象卻成為不必懷疑的「常識」而未必跟著調整。霍騰托維納斯的形象便是屬於這樣的一種跨階級、跨領域甚至是跨國的共同文化資產。

III. 人種類型的大眾印象

⁴⁶同上，pp.181-182.

在莎哈·巴特曼的展出之後，在柏林、倫敦、乃至美國賓州也都有霍騰托女性被帶到該地並受到學界注意的例子。但是霍騰托女性的學術價值似乎已經在居維業的研究後定調，十九世紀後來的研究並未翻新前人的看法⁴⁷。十九世紀的法國人還有幾次在巴黎親眼目睹霍騰托女性的機會。根據現有片段的資料，這些出現的背景分別是Carl Hagenbeck所組織的人種秀、巴黎近郊的動物馴化園（Jardin zoologique d'acclimatation）、世界博覽會以及模仿前者組織模式而興起的殖民博覽會。要瞭解人種類型印象如何從學術社群中少數人的討論變成社會大眾常識的一部份的過程，就必須進一步瞭解這幾個十九世紀中期在歐洲出現的關鍵機構和機制。

1. Carl Hagenbeck 之人種秀

首先是將歐洲的異國動物和人種展示表演推到企業化極致的德國Carl Hagenbeck（1844-1913）的例子⁴⁸。繼承父業的C. Hagenbeck原本是專門從事異土動物秀的事業，因為競爭激烈，入不敷出，逐漸也擴展其經營範圍到人種展示上。研究者均認為他建立這類展示的一種文類（genre），其企業組織規模也為此行建立一種典範。他在1875到1932年間，總共推出七十次以上的人種秀。其事業之成功，使得他在1907年得以建立自己的動物園，並在其中設置長期演出的土著村，以招徠更多的觀眾。他所舉辦的異族人種秀足跡遍及歐洲各國，尤其是德國與法國。而根據研究，當時主要報紙對此類演出皆無負面的評價。事實上，Hagenbeck事業之成功也有賴於他與學界的關係。Hagenbeck本身就是柏林人類學學會的成員⁴⁹。在每一批不同的人種表演時期，Hagenbeck會邀請學會的會員來進行實地的人體測量和訪問，這些遠道而來的表演者就成了學者現成的觀察對象和報告人。學會的刊物也會登出相關的研究報告。另外，Hagenbeck甚至也接受學者的訂單，設法擴大其蒐尋的地理範圍，在表演人種中，加入學者在那個時期需要觀察的族群。除了學會的學者外，人類學博物館也是此種合作模式的受益者之一。因為表演過後的土著服飾器物常常直接捐贈給博物館；而基於互惠的原則，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也會提供給Hagenbeck一些呈現重點上的專業意見。事實上，Hagenbeck在選擇他的部落人種團體時就抱持三個標準：一、必須有明顯的

⁴⁷ François-Xavier Fauvelle-Aymar, *L'invention du Hottentot*, pp. 322-359.

⁴⁸ Hilke Thode-Arora, "Hagenbeck et les tournées européennes: l'élaboration du zoo humain" in Nicolas Bancel, Pascal Blanchard et al. (eds.), *Zoos humains: De la Vénus hottentote aux reality shows* (Paris: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2002), pp. 81-89.

⁴⁹ 同上，p. 87.

奇特性，一下子就可以吸引觀眾的目光，但又不能怪到令人難以接受而不敢觀賞的地步。二、其外型必須能讓西方觀眾感到某種美感和特質。第三個選擇標準則是人種的畸怪程度，例如：特別矮或特別高、脖子特長、嘴巴特大、腳特小等等。而在選擇單一個人做展示時，他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必須道地，真正具有其種族類型特色（*types authentiques*）⁵⁰。Hagenbeck的選擇標準在某個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學界的認知狀態；而學者的觀察又是建立在經過他挑選的人身上。某部落土著的體型或文化典型特徵就透過這樣的一來一往不斷被循環強調。再從這些表演所受到的觀眾歡迎的程度來看，可以想見當時大眾在觀看這樣的表演時，除了滿足對所謂異文化的好奇外，也學習到不少辨認土著的知識。一直到1950年代，德國一部暢銷的百科全書*Brockhaus Enzyklopädie*中所使用的人種類型插圖依據的還是Hagenbeck秀中展出的人。事實上，後來被譽為美國人類學之父的Franz Boas也受到Hagenbeck人種秀的影響。1885、1886年間，Boas在柏林看過Hagenbeck所推出的Bella-Coola族人的表演後，時年不滿三十的Boas開始對北美洲西北太平洋岸的印地安人產生濃厚的興趣，而他的田野調查所使用的主要報告人之一就曾經與Hagenbeck的招募人一起工作過⁵¹。

2. 動物馴化園

在人種類型印象的傳播上，Hagenbeck的人種動物秀提供的是娛樂界與學界合作的一種例子，以嚴格定義來看，Hagenbeck畢竟不是學院中人。位於巴黎近郊的動物馴化園（*Jardin zoologique d'acclimatation*）則是學院中人從娛樂界得到靈感而自行操作的例子。Etienne Geogeffroy Saint-Hilaire的兒子Isidor在1854年創辦了動物馴化學會（*Société zoologique d'acclimatation*）之後，在1860年創辦了這個動物馴化園。此動物園原先成立的目的是觀察那些新引進法國、由園方負責照管的異土動物對歐洲風土的適應狀況，並且也做一些以人工方式幫助其適應的實驗。除此之外，園方也負有將這些動物介紹給大眾，讓大眾瞭解其特性與用途，將知識普及於大眾的教育作用⁵²。由於其宣傳工作做得不錯，一度有勝過

⁵⁰ 同上，p. 83-84.

⁵¹ 同上，p. 87.

⁵² 有關此學會的歷史，請參見Michael A. Osborne, *Nature, the Exotic, and the Science of French Colonial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4)。Osborne一書將學會的成立以及學會的維持與北非殖民的關係作較多描述，但對於動物園的部分，尤其是在其中舉行的人種展示的部份所述及的篇幅較少。

自然史博物館本身的動物園（la ménagerie du Muséum）的趨勢。當時幾份暢銷的報紙如*L'Illustration*、*Le Temps*、*Le Globe*都固定會報導其活動內容⁵³。1870年代，因為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事件，動物園的活動受到重大打擊。先是因為戰爭必須疏散大量的動物到比利時或法國其他省份，後來的圍城期間，又因為食糧短缺，許多動物成了巴黎市民的盤中餐。動物園的事業自此逐漸走下坡，甚至到了虧損的地步。眼看著動物展示已經無法吸引觀眾，當時的園長Albert Geogeffroy Saint-Hilaire（1865-1893年間擔任此職）⁵⁴，Isidor的獨子，也就是Etienne的孫子，便開始引進土著部落展示表演。從1877到1893年，園方密集地引進了近二十種部落人種展示，之後零星的演出一直持續到1912年才完全終止⁵⁵。由於這種展出受到歡迎⁵⁶，讓動物園的營運得以維持，這個地點當時成了法國境內有關殖民和異土動物、人種和產品的主要的常設展示中心。許多知名的體質人類學家，尤其是Albert Geogeffroy Saint-Hilaire在巴黎人類學學會（*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de Paris*）的同僚，便把這個動物園當成他們研究不同人種的實驗室，組成觀察小組定期前往該園區做訪問和測量的工作。譬如，該園區在1888年7月引進一團十三個霍騰托人，就吸引了Paul Broca的接班弟子Paul Topinard以及在1880年代創建了法國第一個人類學博物館的E.-T. Hamy前往觀察。Paul Topinard並將其觀察報告刊登在當時法國人類學界最主要的學刊*Revue d'anthropologie*上⁵⁷。該學會另一名成員A. Bordier醫師在報上一篇敘述其觀察結果的文章中就特別感謝Albert Geogeffroy Saint-Hilaire提供給他們這樣難得的機會，讓他們不必遠赴異地，就可以進行活體觀察。他也認為在園中所見的展示，比當時開始在歐洲流行的美國Barnum馬戲團的異國人種動物秀更具「科學性」⁵⁸。而另一個學會成員，拿破崙一世的姪孫Roland Bonaparte還指出，民眾到動物園來可以看到活生生的

⁵³ 同上p. 109。

⁵⁴ 同時，Albert Geogeffroy Saint-Hilaire在1872年先是擔任動物馴化學會的秘書，之後在1887到1895年間擔任學會的會長。

⁵⁵ Isabelle Gala, *Des sauvages au jardin: les exhibitions ethnographiques au Jardin d'acclimatation de 1877 à 1912*, unpublished essay, n. d.

⁵⁶ 第一年的兩場展示所吸引的人潮和門票收入就佔了當年度該園區總收入的三分之二。見前註所引資料。

⁵⁷ Fauvelle-Aymar, François-Xavier, "Les Khoisan dans la littérature anthropologique du XIX^e siècle: Réseaux scientifiques et construction des savoirs au siècle de Darwin et de Barnum." *Bulletin et Mémoire de la 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de Paris* 11(1999), p. 461.

⁵⁸ Benoît Coutancier, and Christine Barthe, "Au Jardin d'acclimatation: représentation de l'Autre (1877-1890)" in Pascal Blanchard, Stéphane Blanchoin, Nicolas Bancel, and Gilles Boëtsch, et al. (eds.), *L'Autre et Nous: "Scènes et Types"* (Paris: Syros, 1995), pp. 145-150.

「各式人種標本」⁵⁹。Bonaparte在這個地方所拍攝的一系列人種相片，至今成爲博物館珍貴的收藏。事實上，不僅這個時期的人類學刊物中經常可見到這些知名的體質人類學家在此動物園內所得的觀察結果報告⁶⁰，當時蓬勃發展的科普雜誌更是樂於以此爲主題，將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紹給其他有興趣的人⁶¹。雖然到了1880年代後期，大部分的人類學家開始懷疑這些觀察樣本的侷限性而不再繼續原先的合作模式，但是一般民眾對異國情調演出的興趣並不受此影響。

有關園方展示人種的選擇，原本是以雙方交涉後可成行的人種爲對象，未必與殖民有關。大部分前往表演的土著是有訂定契約，也有酬勞的。然而隨著殖民帝國勢力範圍的擴張，這些表演族群的選擇有時顯然是配合時事的。譬如在1894年，當法國拿下西非廷巴克圖城（Timbuktu）時，馴化園就安排在當地出沒的游牧民族圖阿瑞格（Touareg）族人的表演。而在法國攻佔馬達加斯加後一年內，也就是1897年，巴黎市民就得以在園內一睹該島土著的「廬山真面目」⁶²。

3. 世界博覽會、殖民博覽會

就在馴化園開始大量引進人種秀的同時，法國政府也開始加入了傳播和塑造人種典型的行列：已經有近二十年歷史的世界博覽會，乃至於後來興起的殖民博覽會，也開始安排人種秀的展示。以法國爲例，從1878年的世界博覽會起開始正式且大量地引進各式人種展出。根據統計，這年有四百多名土著參與博覽會的展示活動⁶³。1889年的世界博覽會正逢法國大革命一百週年，主辦單位則是借用了傷殘戰士之家前方的廣場安置了幾個有著真人居住其中的土著村（village indigène、native village）⁶⁴。1900年跨世紀的博覽會更是擴大舉辦，在巴黎市西北的Trocadéro廣場小丘陵上，也就是民族學博物館後方與艾菲爾鐵塔隔塞納河相對之

⁵⁹ Benoît Coutancier, “Exhibitions ethnographiques et vulgarisation scientifique(1877-1890)”, in Benoît Coutancier (ed.), *Peaux-Rouges: Autour de la collection anthropologique du prince Roland Bonaparte*, Thonon-les-Bains: L’Albaron, 1992, p. 38.

⁶⁰ 見Michael A. Osborne, *Nature, the Exotic, and the Science of French Colonialism*, pp.125-129。

⁶¹ 以法國爲例，有*Le Journal illustré*、*La Nature*、*Science et Nature*、*La Science illustré*、*La Science populaire*等。見Benoît Coutancier, “Exhibitions ethnographiques et vulgarisation scientifique (1877-1890)”, p. 40。

⁶² William Schneider, “Race and Empire: The Rise of Popular Ethnography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11.1 (1977): pp. 101.

⁶³ Raymond Corbey, “Ethnographic showcases, 1870-1930”, *Cultural Anthropology*, 8, 3 (1993): pp. 338-369.

⁶⁴ 法國此次土著村的設計，似乎成爲日後其他國家同類展示概念的原型。參見Anne Maxwell, *Colonial Photography and Exhibitions: Representations of the ‘Native’ People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an Identities*, London: Leicester UP, 1999, p. 19。

處，參觀的民眾可以看到完整的法國殖民地的土著村聚落全景。這樣的操作模式一直到 1931 年，法國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國際殖民博覽會中還隱約存在。而主辦單位在設計這些土著村展示時，便是邀請人類學家與殖民官員為指導委員。在那樣一個交通不易、旅遊並不普及的年代，原本只有貴族階級可能從事的環遊世界的活動，由於博覽會的主辦單位透過這種全景式的展出，讓一般民眾有環遊世界一週的想像。事實上，主辦單位當時喜歡用的口號便是：一張博覽會的進場券，讓您花幾小時就可以輕鬆環遊世界一週⁶⁵。以世界博覽會吸引到的數千萬人次來推想⁶⁶，可以想見異族人種和文化的印象是如何深入到歐洲帝國中心的人民腦海裡。

綜觀這三個性質不太相同的機制所運用的展演方式，一開始土著只是被安排做靜態的展出，後來主辦人逐漸要求加入一些手工藝示範、儀式演出、歌唱舞蹈或是打鬥作戰的場面，有時甚至有獵人頭的表演。在文宣上，主辦單位的說明文字則是強調，某某部落的人就是以某某儀式為其社群生活重心；而某某游牧民族以驍勇善戰有名，所以主辦單位安排他們作戰士舞演出等等。在戰士舞受到觀眾歡迎的情況下，很多原本並不以善戰聞名的土著部落也經常被安排一些競技的演出。

人種學所提供的分類和高低等級標準為專門引進異族人種來展示的商販提供了某種徵選和宣傳上的依據。當這些外部特徵變成判定土著真確性的指標，某種以部份代替全體、以具體代替抽象的換喻作用就在博物館的展示、人類學畫像、博覽會所發行的明信片、大眾媒體的報導中，將有關某個異族人種、部落的平面知識傳輸給一般民眾。事實上，當這些異土罕見的人種來到歐洲，不再被以怪物看待、而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物時，動物園、博覽會、甚至博物館所舉辦的土著秀總是喜歡標榜這樣的展出帶有「寓教於樂」的功能。問題是，在觸及異族人種或文化主題時，這種習於寓「教」(education)於「樂」(entertainment)的方式，往往使得這些已經經過層層簡化的刻板印象更容易成為異國情調文化消費的一部份。十九世紀末住在歐洲中心的民眾，即使從未到過美洲或非洲，對於印地安人或布希曼人的外型特徵也絕不陌生。當時有多少布爾喬亞家中的擺飾品

⁶⁵ 這樣的宣傳口號在 1937 年改建落成的人類博物館 (Musée de l'Homme) 的開幕文宣上依然可見。

⁶⁶ Pascal Ory, *1889: L'Expo universelle* (Paris: Editions Complexe, 1989), p. 109。根據這位作者的資料，1889 年的參觀人數以保守估計，大約是二千五百萬人，是 1878 年博覽會的兩倍；而 1900 年的參觀人數又多於 1889 年。1931 年的殖民博覽會則是吸引了三千三百萬人次的參觀人潮。

中沒有幾個非洲鼓呢？有多少這些家庭的小孩沒有戴過印地安羽冠、扮過追紅番的遊戲呢⁶⁷？整個十九世紀，在民間業者、學者、國家官員之間逐漸形成一個傳播和確認這類形象的機制，而學者在其中扮演了專業鑑定和專家背書的角色。由於學界在理論上提供了每一族類的特徵標定，使娛樂業有了標準依據，也使國家的殖民管理有了某種秩序的想像和準備。

結語

回顧西方世界土著人種展示的歷史，霍特丹維納斯的例子正處於兩種展示傳統的交接點。在十九世紀之前，非西方人，尤其是所謂的原始部落的土著，被帶到西方國家展示的例子十分有限，而且多是零星的、單一個人的情況。這種展示接近是一種奇珍異品的展示，而且展示的地點多在宮廷或貴族沙龍，以其營利的例子還不多。也由於數量稀少和展出地點的特殊性，這些人物其實被賦予比其後繼者高級的地位。如同怪物展示，在十七世紀還被以奇觀看待，時人甚至讚嘆為上帝的傑作或上帝開玩笑的產物。由於以其殊怪為勝，並無高等低等之分，在沒有任何預設的標準之下，每個展示者都是獨一無二的⁶⁸。這樣的情況到了十八世紀末自然史領域中人種研究的發達而有了明顯的轉變。人種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後，每個人種在學者所擬造出來的世界自然秩序中有了既定的位置。討論的焦點因此被放在夠不夠有代表性，是不是所屬人種的典型等問題上。而隨著學界把討論焦點從個人特徵擴大到群體特性，十九世紀後半葉在動物園、博物館、博覽會這些跨階級、跨職業的交流場域中，逐漸興起的是一種更具組織性、企業化、甚至營利的異族人種和文化展示。這已經是大眾傳播發達時代的娛樂現象。土著人種秀一直到現在仍以各種精緻的變形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經過一、二個世紀被形塑成的刻板印象被反覆地期待和證實。

今日我們當然可以大聲批評這些演出是種族歧視的產物，不過，有些反種族歧視的法國人類學者，如Georges Balandier，在回顧自身學術經歷時卻不諱言，

⁶⁷ 有關十九世紀法國家庭及私人空間的安排，可以參考例如：Roger-Henri Guerrand, “Espaces privés”, in Philippe Ariès, Georges Duby(eds.),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tome IV, Michelle Perrot(ed.), *De la Révolution à la Grande Guerre*. 有關殖民運動對法國日常生活如家中擺飾、流行服飾等方面之影響，可參考Histoire月刊專號：*Le temps des colonies*, n° 69, 1984。

⁶⁸ Rosemarie Garland-Thomson, “Du prodige à l'erreur: les monstres de l'Antiquité à nos jours”, in Nicolas Bancel, Pascal Blanchard, et al. (eds.), *Zoos humains: De la Vénus hottentote aux reality shows*. (Paris: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2002), pp. 38-48.

他是在小時候和父母一起去參觀世界博覽會、動物園時，看到這些異族表演，而從此產生對異文化的好奇，影響了後來職業的選擇⁶⁹。法國的科學哲學家Michel Serres在一本有關漫畫人物丁丁（Tintin）和人文科學的散文集中也指出，由於他小時候在動物馴化園的經驗和閱讀《丁丁在剛果》（Tintin au Congo）這類現在被指出是充滿種族歧視的讀物所帶來的想像，使他雖然學的是理工，但一直對人文科學保持高度的興趣⁷⁰。這類的反例當然不能為龐大的種族歧視機制辯解，卻提醒我們，相關的議題之複雜與弔詭處，需要我們從多方面作更細緻的關照。事實上，今日南非取回莎哈·巴特曼的遺骸予以安葬，的確是在她身後近兩百年還給她作為一個人的尊嚴：不再是怪物、不再是標本、而是一個人。但是巴特曼之所以被選中並且被以紀念先烈的形式下葬，而不是其他同樣客死異鄉但是更沒沒無名的霍騰托女性，不正也是因為她受到居維業的解剖，在歐洲的自然史冊上留下霍騰托維納斯的名號，而使她比其他同胞更具有雪恥的象徵力量？因為被解剖而在居維業的整體收藏中被保存下來，她在人種研究的論述中不正是被認為是代表霍騰托族女性的典型標本嗎？在法國國會經過幾番討論，而終於決定歸還的幾個理由中，「不再具有科學價值」是主要讓法國有下台階的理由。今日我們除了批評歐洲種族歧視造成異族形象醜化等等，更必須要瞭解的或許是那個連操作者都願意貢獻其遺體作為研究的科學思想背景和操作機制。

受到自然史作法的影響，十九世紀發展中的法國人類學與人種研究以系列資料蒐集與分類、比較研究為主。由此建構起一個以世界為資料來源範圍、以博物館作為資料集中處理和理論出產中心的長程動員網絡。其出產的理論被認為有普世的價值，有解釋世界萬物的效力。帝國勢力的擴展有助於此網絡範圍之延伸和運作效率之提高，而每一個被發現的世界人種依其外部特徵在此資料庫的理想秩序中都佔有一定的位置。此類型標本之確立成為逐漸媒體化、企業化經營的土著人種展演之依據。這類土著展演的觀念和作法，乃至於以帝國博物館為核心所建立的長程網絡雖然在殖民時代得到相當助力，卻不因殖民事實的結束而消失。直到今天，這樣的資料、工具、人員的動員模式仍在運作，原始資料集中的方向也沒有太大改變，只是國際學術的中心有些從歐洲轉到北美，而負責採集和輸送資訊原料的人員不再只有從科學帝國中心出發的旅行家、學者，第三世界、學術邊陲國家的留學生和學者也加入了這個行列。雖然這些帶著地方資訊到中心的人員

⁶⁹ Georges Balandier, *Conjugaisons*(Paris : Fayard, 1997), chapter 2.

⁷⁰ Michel Serres, *Hergé, mon ami: Etudes et portrait* (Paris : Moulinsart, 2000).

身份與一、二世紀之前有所不同，沒有改變的是分工模式。大部份的學術成果和學說成品仍是由中心的學者製造、出產、外銷，並且用中心語言寫成。而大部份的原料提供國仍然是這些研究成果、理論的進口、消費國。不僅如此，爲了讓自己的原料採集和輸入方式能夠受到整個網絡的計算、生產中心的重視和立即可用，學術邊陲國家還自動參照中心所訂定的工作標準流程作做自我要求，只不過現在參照的不再是品質參差的工作指南，而是高度量化的 SCI、SSCI 等索引中所列期刊的規格。

今昔對照，多少可以看出世界學術邊陲國家的學術發展困境。有關世界或自我的種種，大部份的詮釋權仍然是握在學術中心國家手中。而這樣的困境不是學術中心國家的某些學者在某些交流事務上釋出善意，或長期居住在學術中心國家的第三世界學者在幾個領域中帶頭批評就可以解決的。如何建立自身學術的自主性又不落入閉門造車的處境？如何善用中心國家已經累積的龐大資源又不陷入西方至上的意識型態陷阱？這樣的問題需要處於學術邊陲國家的學者日後更多的研究和思考，而本文於此僅是拋磚引玉之作。

霍騰托維納斯的境遇當然是殖民壓迫與種族歧視下的悲劇，而她的回歸的確是可喜之事。但是，這樣的不平之鳴與欣慰之情不該讓我們忘記去檢視自身在這樣具有帝國性格的知識生產世界網絡中的角色和位置。

參考書目

- Badou, Gérard, 2000. *L'énigme de la Vénus Hottentote*. Paris: Jean-Claude Lattès.)
- Bancel, Nicolas, Pascal Blanchard, et al. (eds), 2002. *Zoos humains: De la Vénus hottentote aux reality shows*. Paris: Editions la Découverte.
- Blanckaert, Claude, et al. (eds), 1997. *Le Muséum au premier siècle de son histoire*. Paris: Editions du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 Blanckaert, Claude, 1987. "'Les vicissitudes de l'angle facial' et les débuts de la craniométrie (1765-1875)." *Revue de synthèse* 4.3-4: 417-453.
- Chaline, Jean-Pierre. 1998. *Sociabilité et erudition: les sociétés savants en France*. Paris, Editions du CTHS.

- Chappey, Jean-Luc, 2002. *La Société des Observateurs de l'Homme (1799-1804): Des anthropologues au temps de Bonaparte*. Paris: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
- Corbey, Raymond, 1993. "Ethnographic Showcases (1870-1930)." *Cultural Anthropology* 8.3: 338-369.
- Fauvelle-Aymar, François-Xavier, 2002. *L'invention du Hottentot: Histoire du regard occidental sur les Khoisan (XV^e-XIX^e siècle)*.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 Fox, Robert, and George Weisz (eds), 1980. *The Orga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France (1808-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P; Paris: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 Jardine, Nicholas, James Secord, and Emma Spary (eds), 1996. *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 Laissus, Yves, 1981. "Les voyageurs naturalistes du Jardin du roi et du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essai de portrait-robot."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34.3-4: 259-317.
- Latour, Bruno, 1987.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 Latour, Bruno, 1995. *Le métier de chercheur: regard d'un anthropologue*. Paris: Institut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agronomique.
- Osborne, Michael A., 1994. *Nature, the Exotic, and the Science of French Colonial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P.
- Outram, Dorinda, 1984. *Georges Cuvie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 Schneider, William, 1977. "Race and Empire: The Rise of Popular Ethnography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11.1: 98-109.
- Williams, Elizabeth A., 1985.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Isis* 283: 331-348.